



Qingnian
SISUOCONGSHU

- 《青年思索丛书》
- 陆炬烈 著
- 广西人民出版社

历史与人民的选择

历史与人民的选择

——谈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

陆炬烈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历史与人民的选择

陆炬烈 著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5.125印张 29千字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20册

ISBN 7-219-01779-0/D·158 定价：2.10元

序

1949年8月，正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即将升起的时候，世界骚然。“斗争中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精神力量的对比，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变化，一个极度下降，降到零度以下，一个极度上升，升到狂热的程度”。这是什么原因呢？具有“高度文化”的西方资产阶级无从解释，杜鲁门的“白皮书”也显得章乱文虚。

但对于中国人来说，以上这样一种历史的骤变，由于其自身的经历和体验，自然会有审慎的思索和明晰的回答。

近代以来的中国，饱经忧患，备受欺凌。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中国在清朝封建统治之下却日益衰落。这一强弱反差，导致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战争等一连串外国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掠夺战争，使古老昌明的中国黯然失色，日渐沉沦。中国历代人民苦心经营的“田园梦”，被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得粉碎。曾经不可一世的“中央帝国”，不得不

面临着充满屈辱、抗争和血泪的道路选择。

为了这个选择，近代以来的志士仁人，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林则徐等封建的士大夫、改革派，力主“师夷长技以制夷”，旨在强国御侮，并躬亲抗敌，但结果因开罪于“洋人”，被清朝摘掉顶戴花翎。封建主义绝不容许内部生长出异己的力量，即使是微弱的力量。洪秀全奋起于社会下层，组织“拜上帝会”，发动农民，指清为妖，引发金田起义，并曾使“太平天国”好梦成圆。但由于农民阶级生产方式落后，思想狭隘，所以他们不可能科学地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矛盾，也不可能提出反对外国列强和封建主义的纲领，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以康有为、梁启超为政治代表的改良派，“公车上书”，组织“强学会”，推动光绪皇帝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一时震动朝野。但是在封建顽固派的打击下，维新百日，戛然而止。以孙中山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共和派，打破近代中国沉闷的政治空气，输入“欧美文明”，以振兴中华为己志，发动辛亥革命，终于把摇摇欲坠的清朝推倒在地，建立了民主共和政府。可惜劳动人民却丝毫也分享不到胜利的果实。曾几何时，这个缺乏群众基础的中华民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强压下，只剩下一个躯壳。事实说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它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之中，一方面有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要求，另一方面又有依赖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致命弱点，所以它没有资格更没有力量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至于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它们从来都是外国帝国主义的附庸，是革命的对象。虽然它们在自身的利益遭到侵害而面临危机的时候，也曾组织过各种各样的党派和团体，作过种种的抗争，如叶赫那拉氏的“后党”及曾国藩、李鸿章等的洋务派所鼓噪的“自强”、“求富”，袁世凯的御用组织筹安会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所玩弄的“独立”、“民主”（实则卖国、独裁）等等。

但是在本质意义上与革命完全不可相容，理所当然只能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而绝不可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选择。

中国人民争独立、求解放的热切愿望和浴血奋战，一直到了20世纪20年代，才有了新的寄托和前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这决不是因为共产党有什么超人的神奇力量，而是因为它是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谋一己私利的无产阶级政党。19世纪中叶产生的中国无产阶级，论资格它要比民族资产阶级老一些。而更重要的是，它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较之于各国无产阶级来说尤为突出，当然也就为中国的各革命阶级所无以伦比。中国的“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中国近代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①。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它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被历史和人民所选择，也是绝非偶然的。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所揭起的鲜明的革命旗帜，为历史和人民所注目。它以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洞察世界发展的方向和中国前途之所在，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性质、任务和动力，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并使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衔接起来，渐次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这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对比中，无疑是最佳的理论和路线抉择。它从世界潮流和中国国情出发，既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又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中国人民为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枷锁和避免亡国灭种的命运，找到并拥护中国共产

^① 《毛泽东选集》整排4卷合订本，第7—8页。

党，这正是风云所聚，大势所趋。

中国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作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促进历史和人民对它的坚定选择。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力挽狂澜，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积小胜为大胜，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找到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等一系列克敌制胜的法宝，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以非凡的革命气概和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领导各族人民冲破重重艰难险阻，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和1927年、1934年两次严重失败的考验，终于在1949年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斗争，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它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绝不是历史的误会和人民的饥饿选择。

近代以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各种政治派别，有如过眼烟云，但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因而都只能抱终天之恨。自称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得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支持和大量美援，养有几百万军队，以“合法大党”自居的蒋介石国民党，自以为可以稳操“中国之命运”，但它给中国带来的却是更血腥更黑暗的年代，因而遭到历史的嘲弄和人民的唾弃。苦难的中国历史和人民，唯独钟情于中国共产党，并把它推上了执政的地位，始终对它寄予无限的信赖和热忱，即使在遭到困难和曲折的时候也没有丝毫的动摇。这个事实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任何的政治力量和党派，只有顺应历史的潮流，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才有可能被历史和人民所选择。

目 录

序	(1)
一、十字路口的奔突	
——从“天国梦”的破灭说起	(1)
(一) 文明古国的耻辱	(2)
(二) 洪秀全与拜上帝教	(5)
(三) 阴差阳错的人间天国	(11)
(四) “天国梦”留下的问号	(17)
(五) 洋务派的自救与维新派的改革	(19)
(六) 义和团“扶清灭洋”的教训	(26)
二、长夜难明赤县天	
——革命党人的奋斗与历史的复归	(30)
(一) 孙中山与同盟会	(31)
(二) 革命派与立宪派的斗争	(36)
(三) 辛亥革命的胜利与失败	(39)
(四) 北洋军阀篡夺了革命成果	(46)
(五) 革命党人的再战	(54)
三、东方，曙光初露	
——不是历史的误会	(59)
(一) 新文化运动的发动与局限	(60)
(二) 新道路的探索	(66)
(三) 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	(75)
(四) 马克思主义的最终选择	(79)

(五)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86)

四、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93)

(一) 合作与分歧····· (95)

(二) 新老右派的合流····· (103)

(三) 蒋介石叛变了革命····· (107)

(四) 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 (115)

(五) 谁是中流砥柱····· (124)

(六) 历史打下了问号····· (130)

五、风物长宜放眼量

——让历史告诉未来····· (140)

(一) 如何看待成就与失误····· (141)

(二) 还要“再选择”吗····· (146)

(三) 始终面向着未来····· (150)

一、十字路口的奔突

——从“天国梦”的破灭说起

历史是过去的事实，它充满着对时代的哲理思辨。

在历史的发展中，肯定与否定，原因与结果，本体与变体，偶然与必然等等，始终服从其内部隐藏着的规律性。

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跌宕起伏，诸多舛难。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巨浪相逐，此伏彼起，但都没有能够使中国摆脱被侵略被奴役的困境，跻身于世界前列，这是耐人寻味的。反清的太平天国运动席卷半个中国，坐镇江南半壁，前锋直抵天津独流、北京海淀，清朝危在旦夕。但最后在外国列强和封建主义的夹击下，天京倾覆，前功尽弃。

“扶清”的义和团红灯高照，漫卷京津，给帝国主义的重创前所未有，就连慈禧太后也不得不拜了它的“大师兄”。但它最终还是被清朝统治者镇压、利用、控制乃至出卖、消灭了。维新派居于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之间。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它反对清朝的顽固保守；为了借助清朝的皇权实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它又

“扶清”以求达到君主立宪的目的。折衷的维新派，其结局是谭嗣同等血洒菜市口，清朝江山依旧。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灾难深重，前程如烟。但是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志士仁人始终前仆后继，奋斗不息。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到戊戌政变和义和团运动，都表现了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甘心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反抗精神。为了拯救中华民族，他们在“风雨如磐”之中痛苦地摸索着。但是事实证明，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和先进的政党，因而这些农民的起义和革命战争，总是陷于失败。刚刚出现的嫩弱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表现了改革政治以求发展的要求，但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政党，所以也只能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所绞杀。

爱国救国，振兴华夏，历史是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

（一）文明古国的耻辱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它的文明时代，肇始于奴隶制的夏、商、周，比西欧古希腊、古罗马奴隶制国家的形成早1700百年。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已经成为瞩目于当世的东方大国。到了公元前6世纪，正当古埃及、古巴比伦泯灭的时候，中国早已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封建制逐渐代替了奴隶制。到了公元9世纪，即相当于中国的唐朝末年，西欧才走上了封建制的道路，比中国晚了1300百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是7世纪到13世纪的唐宋两代。唐代的长安，成了世界性的大都市。起自于西汉，繁荣于盛唐的“丝绸之路”，横贯亚非欧大陆，显示了汉唐经济文化的恢宏博大和丰富多姿。宋代的国力和科学发明，遥遥领先于世界前列。就是到了元代，中华文明还是为世人所欣慕的。中世纪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所描

绘的中国景象，至今仍令人神往。而当时的欧洲还比较落后，美国根本就还不存在。只是到了16世纪至18世纪，即从明朝后期到清朝前期，中国的封建社会才逐渐趋于保守，长期停滞于封闭状态之中。虽然此时在江南的苏州、南京及华南的广州等地，出现了丝织业等的“机户”开设“机房”，雇佣“机工”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萌芽，但发展一直迟缓，资产者作为资产阶级始终未能形成。从11世纪起，落后的欧洲赶了上来，几乎与中国同步。当时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米兰、佛罗伦萨，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都曾颇负盛名。但是异于中国的是，从14世纪到15世纪，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不但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而且逐渐形成了资产阶级。由于封建制的逐步解体，以及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葡萄牙、西班牙的殖民主义扩张，德意志的宗教改革，英国的圈地运动，使欧洲的资本主义逐步摆脱封建主义的羁绊，迅速地发展起来。相形之下，中国开始显得落后了。

历史常常发生巧妙的偶合。17世纪前期，是一个多么富于戏剧性的年代。在西方，1640年，英国拉开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资产阶级专政。法国、美国竞相效尤，相继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而在东方，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了明朝政府，代之而起的却是另一个新的封建王朝——清朝。在西方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候，它又把中国的封建破车，在泥泞的道路上拖拉了267年。

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和高地租，清朝的重农抑商政策和闭关锁国政策，不仅阻滞了新生产力的发展，而且禁锢了中国和外国在经济文化交流。虽然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阻遏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它阻碍了社会进步，延缓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早在战国时期，聪慧的中国人发明了一种辨别方向的仪器，叫司南。到北宋时，在此基础上加以改造，制成了指南针。明朝

前期郑和下“西洋”，到了文莱以西的南洋各地，还到了印度洋沿岸一带，比意大利哥伦布西航发现美洲新大陆早87年。这一航海史上的壮举，其导航之器就是中国自己制造的指南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指南针的制造方法经阿拉伯、波斯传到了欧洲。15世纪到16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海盗式的“寻金热”和资本原始积累不断升温，指南针便派上了用场。1415年至1416年间，葡萄牙人首先用指南针“回敬”了中国，带着武装的船队，闯入了广东的珠江口。

从18世纪到19世纪，英国逐渐代替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的海上霸主地位。它的殖民主义触角，伸到了中国的东南沿海。开始以东印度公司为中转站，向中国输出毛织品及棉花等物，从中国输入茶叶、蚕丝，但常常出现入超。能够填补这一贸易逆差的，从它的经验中，唯有被称之为“阿芙蓉”的毒品即鸦片一物。从1773年到1839年间，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输出，从1千箱增至4万箱。以当时每箱七、八百银元计，仅鸦片战争前一年，中国就外流白银3200万元。美国及其他国家对中国的鸦片贸易掠夺与此相比恐怕也少不了多少。

鸦片的输入，不仅糜费了中国大量的民脂民膏，而且使吸食鸦片者萎靡废业。对于英国殖民者这种不顾商业道德的巧取豪夺，中国当然不能置之不理。冷眼向洋看世界的林则徐惊呼：鸦片若不禁，恐怕十年后不但无饷可筹，就是可用之兵也没有了！1839年，他奉朝廷之命到广州禁烟。当230万斤鸦片在虎门经盐卤、石灰泡化销毁汨汨流入海中时，就是目睹的外国商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对鸦片侵略是如此的深恶痛绝。

英国当局决定用武力报复中国。于是，1840年爆发了鸦片战争。一个衰败的中国封建王朝，对付一个已有二、三百年殖民扩张经验和势力的英国，失败已在定数。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蒙受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奇耻大辱。割地赔款，

开放通商口岸，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等等条款的规定与实施，使独立自主的封建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

中国就是在这样的哀怨声中步入近代的。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使中国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或象西方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宫廷式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解体，客观上使民族资本得以产生和发展。但是英国的鸦片和大炮，不是要使中国资本主义化，而是要使中国殖民化，成为它的附庸。英国、法国、美国等在中国蛮横残暴的殖民统治，人们只要去翻一翻当年的史料、实录，看一看当年以租借地名义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建立起来的“国中之国”，看一看当年的“西方文明”如何将华人与狗等同起来，就断不会轻易去受那些“三百年殖民地”救中国的蛊惑和蒙骗了。

鸦片战争的炮火，把古老的中国推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十字路口上。它犹如东方醒狮走出莽莽丛林，面对光怪陆离的世界，不知何去何从。

（二）洪秀全与拜上帝教

中国历来是一个不乏思想家和实践家的国度。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引起社会大动荡的时期，不少人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鸦片战争失败后，洪秀全可谓是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第一人。

洪秀全的出现决非偶然，他是时代“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宠儿。他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幼年就读于私塾，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既读四书五经，又博览各种奇杂书籍；既执鞭教化蒙童，又下田干农活，深知社会的腐败和农民的疾苦，算是个离经叛道的乡村知识分子。从16岁到30岁，他4次赴广州应试，希图通过科举步入仕途，然而总是名落孙山，连个秀才也混不上。

这对他来说，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打击。他曾经大病一场，说了一连串别人无法理解的昏话。

幻想的破灭，使他逐步面向现实。当时的广东，是禁烟斗争很激烈的地区，同时也是天地会斗争连绵不断的地方。反封建、反侵略的斗争，对他的思想起了很大的影响。他赞扬天地会的反清精神，但又不拘同于他们的复明主张，说明他对历来的农民斗争是有审慎态度的。他每与人议论时政，常常慷慨激昂，悲叹国中无人，以致受“鞑妖”所奴役。在谈到外侮内患时，他竟拍案而起：“每年化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收华民之脂膏数百万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2百年，中国之民安得不贫？贫者安能守法？”^①说着竟涕泪纵横，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他的革命意识逐步明确。但是，如何唤醒民心，广结民众，以致“风云聚会”？他苦思冥想，找不到什么可以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一个偶然的机，使他想起了第二次赴广州赶考时得到的一本奇书《劝世良言》。这是一个叫梁发的肇庆人，为英国伦敦传教会编写的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书中说，上天的独一无二神是上帝，此外再无别的神。上帝是“全世界众人之大父”，是造天造地造万物的大主宰，是人间一切荣华富贵的赐予者。后来他经常出入广州的礼拜堂，在罗孝全的指导下仔细研读《圣经》，从救国的目的出发，对它的“合理”成分加以选择取舍。于是他把西洋的上帝与中国古代的上帝联系起来。他熟读儒家经书，当然有这个功夫。他从《诗经》、《书经》、《易经》乃至孔孟的论著中，找出了许多有关“上帝”的说法及其事迹，比如“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之类。认为中国古代也崇拜上帝，中外一理。只是因为“番国”崇拜到底，所以发达领世界之冠。而中国自秦始皇以来，人间君王竟僭越称帝，把上帝撇在一旁，从此走入鬼

^① 《太平天国》Ⅱ，第570页。

路，以致被淫妖所捉弄，被洋夷所欺侮。这样，洪秀全中西合璧的拜上帝理论便逐步形成了。

洪秀全的拜上帝理论，集中体现于1845—1846年间他所写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中。他从农民的平等观念出发，认为“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都是赖上帝“一元之气”所化生的“赤子”，本是和睦共处的。只是到了后来，由于有“阎罗妖”、“老蛇妖鬼”之类，在佛的掩护下注入生死，摄入灵魂，颯然称帝，把人们“缠捉磨害”，才造成了凡间的种种苦难。因此，对于凡间皇帝，“我们兄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者也。”^①只有这样，死后才能魂升天堂。他进一步指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尊卑贵贱之分。否则就是对上帝的极大冒犯，就要受到“天条”的严厉惩罚。这实际上是对封建神权和封建皇权的大胆挑战和彻底否定。它要以看不见摸不着然而却权威无比，并在西方显灵上千年、几百年的天上皇帝，来杀戮中国大地上享有至高无上特权的世袭皇帝，荡平人吃人的封建等级制度。他还指出，中国正处在“极暗”、“极乱”的时代，彼国憎此国，此姓憎彼姓，彼人憎此人，“尔吞我并”，“陵夺斗杀”。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一出于私”。所以必须尊崇万能的上帝，奋起相救，使“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以实现人人饱暖，个个幸福的“大同”世界。为“挽已倒之狂澜”，摧毁乖漓浇薄之世界，大家必须跳出“邪恶之鬼门”，勇作“中流之砥柱”。只有这样，才能“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夜退日升”。这既充满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又鼓舞人们斗争必胜的信心。如何斗争？就是对阎罗妖、邪魔、蛇鬼之类必须“击灭之”，采取暴力手段，推翻极权。

^① 三联书店《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第109—114页。

的统治。应该说，这些理论在近代的中國，是有争独立、争民主、争人权、争平等的进步意义的。在当时，提出这样一些具有神秘色彩的理论，对于那些迷信“天命”，希望有一个好皇帝来搭救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一种折射式的启蒙。

在拜上帝理论形成的过程中，洪秀全创立了拜上帝教。冯云山、洪仁玕是最早参加拜上帝教的积极分子，他们为拜上帝教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拜上帝教在当时封建统治比较牢固，同时又为列强所钳控的广东无法立足，于是洪秀全、冯云山来到了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广西桂平紫荆山区。苦于地主阶级团练压迫的贫苦农民和烧炭工人，从这两位教书先生那里找到了救命之星。杨秀清、肖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先后成了拜上帝教的核心人物。

拜上帝教和东汉末年的太平道以及元末清中的白莲教一样，都是反对封建统治的民间秘密宗教组织。所不同的是，它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身受外国列强和国内封建势力以及满族贵族的多重压迫，故其革命更富于斗争性和理想性。它把古代的大同思想与现实世界以强侵弱凌杀斗夺相比较，激发人们对黑暗社会的强烈憎恨和对平等天国的热切追求。同时，它以行时于西方的基督教为蓝本，以中国当时的苦难为大背景，所以较有理论性和现实性。它虽然仍以宗教的形式出现，但用的是影响较大的西洋宗教而不是日趋没落的民间宗教，所以使人们有耳目一新之感，易于趋集和接受。还有，它是推崇上帝反对皇帝，主张一神论反对多神崇拜的，所以有顽强的排他性和向心力。人们只要加入拜上帝教，就举家同往，舍弃私产，生死相扶，义无反顾，把希望完全寄托于上帝和天国。人们思想和行动的专一化，是以往的农民反抗斗争所没有的。所有这些特点，都表明拜上帝教同历史上农民起义借用的宗教本质上既是一样的，但在理论形